



海外是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王东

2009-8-26 11:15:39

来源：北京日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历史性课题。如果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

就国内研究而言，“百年轨迹”大致可概括为“一个主题、两个层面、三种类型、十八家比较研究”。所谓“一个主题”，就是近百年历程一以贯之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条红线和主题。所谓“两个层面”，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有政治的和学术的两个基本层面。政治层面的研究往往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运动密切相关，更加关注党的基本理论建设，关注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问题。学术层面的研究虽然也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有着内在联系，但形式上却相对独立，更加注重学理关系的考辨和学术研究的探讨，概括地讲叫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三种类型”，其一是指以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领袖的研究，他们的主要贡献在政治层面，党的基本理论建设层面；其二是以李达、艾思奇、张岱年、冯契等老一辈著名专业哲学家的研究，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化、大众化、通俗化研究，综合创新，造诣深刻，见解独到，自成一家之言；其三是承担了国家相关课题，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专业学者的研究，包括中央党校许全民等人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马俊峰等人的研究，北京大学王东、郭建宁等课题组的研究，共有“十八家”之多。他们在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紧密联系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形势，结合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厚积薄发，势头强劲，力图实现新的理论创新。

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借鉴海外研究，对于我们开阔理论视野，升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澄清海内外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及其发展规律，增强人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在实践中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受语言文化、社会发展、资料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海外研究的再研究还很不够，已有的研究往往只限于某一局部或某一阶段的正面问题的介绍或阐述，缺乏通盘系统的考察，条块分割的情况比较严重，尤其是对海外提出的挑战性问题缺乏必要的分析和回答。成龙的这部《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较好地弥补了上述研究的缺陷。在我看来，其理论创新突出表现在：

第一，对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进程做了系统的考察。作者以海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为主线，对海外研究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梳理。作者以大量的资料说明，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心，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集中在对毛泽东思

想的研究，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集中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9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集中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海外研究的重心转向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这种学理渊源的考察，客观上打通了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历史，描绘了一幅海外研究的整体历史图景，为学术界系统地理解海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

第二，对海外研究的核心问题、基本观点做了全面的清理和概括。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尽管海外研究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哲学基础、价值取向、历史地位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本质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还是背离和否定，或者说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作者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海外学者坚持“继承发展论”，不仅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个性，而且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性。但也有少数学者坚持“割裂对立论”，他们只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个性，否认二者之间的共性。作者抓住了海外研究的总纲，廓清了海外研究的整体面貌，提供了一条海外研究的问题线索。

第三，对海外研究提出的挑战性问题的初步分析和回答。针对海外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异端论”、“唯意志主义论”等观点，作者深入考察了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以及“意志”在毛泽东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深入分析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根据海外关于晚年毛泽东及其“文革”的研究，探讨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及晚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分析了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产生误解、误读的主要原因。针对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非毛化论”、“经济决定论”、“后社会主义论”、“实用主义论”等观点，作者深入探讨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对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精髓与欧美实用主义基本精神进行了全面比较，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以及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做了深入研究，剖析了海外某些学者得出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针对海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提出的“民族主义论”、“新保守主义论”等几种观点，作者深入分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及其价值取向。针对海外科学发展观研究中提出的“混合论”、“中国威胁论”、“殊途同归论”等挑战性观点，作者深入分析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源，价值取向和理论创新。作者在分析诸多尖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理论成果是主客统一的新型世界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国现代化的新型发展观的统一整体。

作者还指出，海外学者的研究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特点。比如，他们重视比较研究、心理研究、文本研究、结构研究的方法，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且通过实际考察谈论中国历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关系，研究重心随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来不把研究重点固定在某一局部或某一个别问题上。作者的分析，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另外一种思路和声音，对于开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视野是具有重要启迪作用的。（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转载请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